

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

Zhongguoshidai Jingji Mingjia Jingdian Wencong

卫兴华

经济文选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

Zhongguoshidaijingji Mingjia Jingdian Wencong

卫兴华

经济文选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卫兴华经济文选 / 卫兴华著.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1.1

(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 / 张卓元等主编)

ISBN 978-7-5119-0336-5

I. ①卫… II. ①卫…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9387 号

书 名: 卫兴华经济文选

出 版 人: 宋灵恩

作 者: 卫兴华

出版发行: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邮政编码: 100044

发行热线: (010)68320825 68320484

传 真: (010)68320634

邮购热线: (010)88361317

网 址: www.cmepub.com.cn

电子邮箱: zgsgdjj@hotmail.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01 千字

印 张: 17.25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9-0336-5

定 价: 40.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时光荏苒，我从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迄今已六十四年，从事经济理论工作也已经近六十年了。正如解放前的旧中国苦难深沉、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一样，我的个人经历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在前进道路上有起伏、有波折，有顺境、有逆境。

回顾我的学术生涯，自1952年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至今，除下放劳动、参加“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走“五七”道路时期离开了专业工作外，我一直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我经历了政治生活和教学与研究工作中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凭着一种责任心和对事业的追求，在努力做好自己所承担的教学工作的同时，总是要背负着精神压抑，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从事一点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写一些经济学方面的文章。由于在思想认识上跟不上“左”的一套理论和政策，发表的东西主要是纯理论方面的。例如，有关《资本论》问题的研究，关于劳动价值理论、价值规律、地租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按劳分配等理论问题的探讨。有些理论性和争鸣性的文章，也是纯学术性的。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道路上，既要正确面对传统理论受到的挑战，也要厘清那些强加在传统理论中的错误观点。

改革开放以后，一系列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了出来。由于经济理念与社会实际的结合更加紧密，我研究的内容也逐步扩大。在继续研究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同时，重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论、经济运行机制理论和所有制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更多地转向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公平与效率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方面。

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我主张“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理论是真理的喉舌，而不是权势的奴仆。不做“风派理论家”。尊重权威，而不迷信权威。主张在学术讨论中应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少点装腔作势、营造政治声势之

类的东西。我奉行的治学格言是“四严”原则：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论证和严谨的学风。要通过独立思考，做到求真求实、服从真理。古人云：“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我力求遵循这一科学的治学态度。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将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发展与改革的经济实践相结合，怎样梳理、总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怎样将坚持、继承和发展、创新统一起来，怎样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经济学界需要长期努力以赴的研究课题。

从事经济理论研究至今，我发表了 800 余篇学术论文和文章（少量的序言、书评之类），其中的一些观点得到了理论界的认同。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邀请我将学术论文做一精选结集成册。我主要是从近几年来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中，选出了 31 篇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对马克思经济理论坚持与发展的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对改革开放和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对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研究；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对澄清经济理论是非问题的研究等。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的一些理论思考和见解。我曾是“左祸”的受害者，我不赞同“左”的一套理论和实践。但我不赞同以右反“左”，将不带引号的、代表革命和进步的左与带引号的“左”等同起来，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也作为“左”来批判。我的理论认识与观点是否正确与科学，需由学界同仁与读者来评判。

抗战胜利后，随进山中学迁回太原，于1946年参加地下革命工作，担任进步社团“投枪社”编辑组长、“青年读书会”干事长、党安排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1947年秘密赴解放区，在太行区党委太原工委履行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手续。后被捕入狱，严守了党的机密。出狱后，于1948年6月受组织安排到北平从事革命工作。1948年11月初回到解放区，入华北大学学习，1950年在北京转入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习，同年8月被调入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做研究生。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和理论经济学分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总编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科规划小组成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全国老教授协会社会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课题组成员、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资本论》研究会顾问、中国工商管理学会常务理事，还兼任福建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兼职教授，并担任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名誉院长。

1981年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1991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第二届论文奖，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央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论文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四届中国图书一等奖，第五届中国图书二等奖等共20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2010年获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杰出成果奖。

ZHUYAOZHUZUO

主要著作

卫兴华、胡钧、吴树青：《〈资本论〉第二卷简要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卫兴华、洪银兴、魏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人民出版社，1986年

卫兴华：《政治经济学研究》（一），求实出版社，1987年

卫兴华：《政治经济学研究》（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卫兴华主编：《市场功能与政府功能组合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卫兴华、顾学荣主编：《探索、改革、振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卫兴华、洪银兴、魏杰：《经济运行机制概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

卫兴华、顾学荣主编：《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2004年第5版

卫兴华、马庆泉：《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

卫兴华、胡乃武主编：《经济管理大系·基础经济知识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卫兴华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卫兴华、吴树青、洪文达主编：《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

卫兴华、黄泰岩：《我国新经济体制的构造》，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

卫兴华主编：《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卫兴华、洪银兴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卫兴华、林岗主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卫兴华、赵家祥主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卫兴华、张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卫兴华主编：《政治经济学概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

《卫兴华经济学文集》（第一、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卫兴华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卫兴华经济学文集》（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

《卫兴华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5年

《卫兴华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与“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编委会 (以下简称“编委会”)的对话

编委会：卫兴华老师，作为国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您的许多理论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广为人知了。您认为在您的创新研究中，有哪些特别需要提及的可以和我们一起谈谈呢？

作者：首先，我想说明的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面临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很多很复杂，需要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和解决。有许多学者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于我本人来说，不过是联系实际国情进行了一些理论思考，有一点自己的心得而已。能否算作理论创新成果，需由同仁与读者评论。我想主要谈这样几个观点：

一、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问题。大家都知道，20世纪50年代我国理论界存在的有影响的观点，是社会主义非商品经济论、全民所有制内部非商品经济论和生产资料商品外壳论等。而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应是商品，应利用商品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我在《学术月刊》1959年第11期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研究方法问题》，指出，否定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生产资料是商品，“是忽视了不同国营企业之间的独立权利和利益，只看重了它们的统一面，而看落了它们的矛盾面。如果否认生产资料是商品，那么必然导向否认价值规律在生产资料生产中的作用”。这个观点是国内较早提出的。

1984年8月在太原市作报告时，我不赞同反对运用“商品经济”概念的观点，特意提出：“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是要发展商品经济。”（山西《学习与辅导》，1984年第2期）。我又就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经济的原因问题提出，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在占有权上的实际差别和在生产经营管理水平上的差别，要求实现为利益上的差别，决定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必然存在商品经济。这个观点后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为题发表在《经济研究》1985年第6期上。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实践突破了马克思主义者曾信奉了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传统观念。这时，有的学者提出，当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商品社会主义就会转入产品社会主义，商品经

济会逐步消亡。我不同意这种论断,我认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需要存在和发展商品经济,不会出现一个消除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

二、积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较早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但又指出不应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相混淆。改革开放初期,我于1980年在《新湘评论》上刊出《关于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论述了“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的客观依据”。“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就必须不顾现有的经济条件,把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以外的其他一切经济成分很快地统统消灭光?极‘左’路线就是这样看和这样做的。表面上看来,这很‘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似乎很坚决,但实际上是拉社会主义的后腿,损害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又提出,广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公有制经济外,还应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来讲,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行为,会汇合成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私营经济》,载《经济纵横》1993年第3期)。“市场经济既然是从通过市场调节实现资源配置的角度讲的,那么,这种市场,不管是哪种经济成分参与的,都一样起资源配置的作用。”“公有制经济参与的市场同样调节私有制经济。反过来,私有制经济参与的市场,也调节公有制经济。从这个意义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构成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载《阵地》1993年第6期)。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赞成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但我并不赞同把“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等同的看法。前者只以公有制为基础,不包括非公有制经济,而后者则包括。

编委会:发展商品经济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你的这些见解,今天看来仍然有启发意义。不过发展商品经济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是的,上面所说的是经济体制问题,而改革还需要重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如何构建适应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就有现实的迫切性和理论上的创新性。我的第三个主要观点,就是我和洪银兴、魏杰较早地提出了“纵向二层次调节”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新机制,也可以说是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早在1986年,我们就根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取向改革的要求,提出了“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这样一种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模式,发表于《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它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

制相吻合。我们当时提出，计划与市场应当是主导与基础的关系，既要以市场调节企业为基础，又要以计划调节市场为主导。1989年北京风波以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似乎成了禁区。但我仍然坚持，并继续发表论著进行阐述。我指出，计划调节对市场调节起主导作用或导向作用，是高层次的调节，而市场调节则是基础层次的调节，这种调节机制是二层次的纵向结合关系，并不是何者为主何者为辅的关系。现在看来，这一关于“计划与市场”之间是主导与基础的关系的论断，与我国后来广泛认同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的内容是一致的。

编委会：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改革到位了，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有了保障。您的上述观点显然具有其理论价值。不过，在理论上迈过这两个问题，新的理论难题却往往又会随之产生。

作者：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个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经济体制改革当然不能仅止步于体制和机制。所以，第四，就是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具体地说，应当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间的关系？传统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要消灭竞争，只有竞赛。改革开放初期，反对在公有制内部开展竞争的思想认识比较强烈。我赞同国有企业展开竞争，我在《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间的竞争问题》（载《经济科学》1980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要发展商品经济，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就必然要求国有企业开展竞争。因为通过开展竞争能克服效率低下的弊端，这是搞活国有企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不仅要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展开竞争，也要在国有企业之间展开竞争，通过竞争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

当然，要竞争，就必须加强管理，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我注意到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只重产权改革，而相对忽视管理的情况，这是不妥当的。应当说搞好国有企业，既要完善企业制度，也要加强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应当既解决好激励和约束机制问题，更要重视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和发挥其主人翁精神。这个观点我后来在《论“三改一加强”》和《改革与管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等文章中提出了，我至今还坚持这个观点。

编委会：对如何搞活国有企业，您的确做了深入的思考。既要坚持公有制，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又要搞活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这两者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呢？

作者：这就涉及第五个观点即如何看待公有制的“存在形式”和“实现形

式”的关系了。在改革的前期阶段，我国理论界侧重于从“管理体制”上理解经济体制改革。我在1986年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似不应仅仅归结为一个管理体制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首先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运行和实现的具体形式，如公有制的运行和实现形式，按劳分配的运行和实现形式，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和实现形式等”（《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问题》，载《江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9期）。我后来也多次撰文强调“发展和完善公有制，就需要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个观点与中央后来提出的“探寻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是相吻合的。

我认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的存在形式，不是其实现形式。有些学者和官员认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股份制是市场经济时代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我指出这种理解和宣传不正确。需要肯定股份制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对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作用，但股份制并没有否定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存在形式。另外，对“一股就灵”、“一股风”、“一刀切”、下指令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做法，是不能赞同的。现在来看，在实践中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仅需要探索公有制的新的实现形式，重视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更要规范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改制工作。这样，才能使公有资产真正通过股份制这种新的实现形式发挥更大的作用。

编委会：您是一位有独立见解的经济学家，对于改革探索过程中理论界提出的不同观点，您都有自己的独到看法。您如何看待那些与自己见解不一致的观点呢？

作者：对于改革过程中提出的一些不科学的论断或提法，或是那些所谓的主流观点，我认为需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去分析。如果是没有研究过的，我一般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对于那些公开的错误的观点，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能保持沉默。比方说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有几个问题是需要澄清的。

一是如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早在1988年，我就提出了“重视调节和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平”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实质是经济利益机制的转换，不能仅仅侧重于企业外部经济转换，也要重视在企业内部以按劳分配为原则实现利益机制的转换，特别是工资奖金制度的改革。我主张，国家需要从宏观上控制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也需要合理地控制社会工资总额。在个人收入分配关系中，不仅要解决好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问题，也要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防止出现人们的收入同各自付出的劳动和对社会的贡献不相

称现象。那时我就认为，需要通过建立健全国家税收调节制度、采取措施理顺工资水平和标准，并控制部分行业收入增长幅度，来解决当时存在的“体脑倒挂”、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倒挂”问题、全民所有制内部不同部门和行业个人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个人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和分配机制的转换》，载《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10期）。目前出现的分配不公与当时的分配不公相比已发生变化，目前是收入差距过分扩大和贫富分化问题，亟待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我已发表了多篇文章。

二是关于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问题。中央提出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理论界有种种不同的理解。我认为，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并列，容易被理解为“技术工作与管理都是非劳动要素”。其实，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包括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的劳动。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应当这样理解：（1）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实行按劳分配；在外资、私营经济中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在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经济中根据控股情况决定其分配关系。（2）按生产要素分配只存在于不同生产要素分别归不同主体所有的经济中。诸生产要素如归同一主体所有，就不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关系。无论私有制与公有制都一样。如原始社会公有制经济、我国改革前的公有制经济、个体经济、奴隶制经济，都不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3）不能把按劳分配等同于按劳动要素分配。在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是以主人的身份，而不是仅仅作为劳动要素的提供者参与生产和分配。既然这里不存在按土地、资本等要素分配关系，也就不存在单一的按劳动要素分配关系。（4）不能把我国现阶段的分配方式只概括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以此否定按劳分配或将其纳入按要素分配之中。（5）按生产要素分配，首先是按要素所有权分配，收入分配的多少受市场机制制约。（6）有些学者根据按生产要素分配提出了要素价值论，即资本、土地等都创造价值，否定劳动价值论。我最先著文提出，按劳分配不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依据，按要素分配也不是以要素价值论为依据，价值的创造和价值分配是两回事。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实行按要素分配的制度下，提出劳动价值论，否定要素价值论的。

三是流行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问题。我始终认为，这一提法用于指导分配制度的改革很不妥当。“效率优先”作为对生产领域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分配关系中让“效率”优先于分配公平，即初次分配只注重效率，不重视公平，是存在问题的。我一直主张在分配领域中应是效率与公平并重，实现二者的统一与结合。主张生产重效率，分配重公平。我在《光明日报》

2006年9月1日发表的《实现分配过程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以及其他多篇论文，系统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主张应调整流行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这个观点被学术界和有关部门所重视。后来我们看到，中央十七大改变了过去的提法，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重视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新提法。

编委会：保持与社会主流不一致的自己的观点需要有理论勇气，但这却是经济研究中必须坚持的。面对改革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您是保持冷静的经济学家之一，您如何看待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作者：我坚信真理越辩越明。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需要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增长与发展的问题。因为1953~1995年的43年中，我国年增长12%的有13年，都是超高速的不正常增长，这种片面追求高速度带来了诸多弊端，导致我国经济的大起大落，不利于资源的科学利用和经济比例关系的合理化，因而，我主张我们国家不应将高增长速度作为首要政策目标，而应实现“由数量扩张型的快速增长方式转为质量效益型的快速增长方式”，应探求我国条件下高增长率与低通胀率的最佳结合点。我提出年均增长9%的速度与3%以下的通货膨胀相结合的看法。我还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发展与自然资源的关系，既切实保护自然资源，也合理开发自然资源，更要节约使用自然资源。此外，还要拓宽资源利用范围，如开发海洋资源等。

其实，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积累量、分工协作、科学技术、生产资料的效用和利用等，都可以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中起作用，但这些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最终还是从两个方面决定经济增长，一是单纯的数量增长，二是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经济总量。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应主要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向转变。我国以往更多地是重视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速度，而不强调或不很重视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不妥当的。举例来说，我国现有的大型统计资料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条目，许多经济统计资料没有系统的有关劳动生产率的统计，更缺乏实物劳动生产率的统计，这方面的缺陷不利于全社会重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今后，要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要重视科技进步，提高职工的整体素质，将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我国转变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还需要考虑到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科学管理、转变企业运行机制等问题，特别是要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转变相结合，包括投资体制改革、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制度改革等。现在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符合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

编委会：理论经济学是一个宽广的研究领域，如果让您总结一下您这些年来研究的主要方向和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脉络，您会作一个怎样的归纳？

作者：我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财富论、生产力理论、货币理论、地租理论、所有制理论、分配理论等，这些方面有很多地方需要深化，也有许多社会上的误解和曲解需要澄清；二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理论；三是国有企业改革理论；四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最后还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改进，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的研究。我认为，繁荣与发展我国经济学，应当允许和鼓励形成不同的学派，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又不排斥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可以而且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可用的分析手段。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的新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需要拓展，而不能完全局限于传统的生产关系层面。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发展，新的科技革命的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演变，都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影响着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秩序的调整，需要政治经济学作出新的理论研究和分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重视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问题很多；也要研究与发展生产力相关的诸如资源配置方式、经济运行机制、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方式等问题。忽视这些方面的经济利益的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跛足的，也是缺乏生命力的。

编委会：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的理论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您个人有什么期待和希望？

作者：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理论经济学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与创新。这些都是与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联系的。从经济理论工作者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今后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1）社会主义本质论。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即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灵活性结合起来；（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论。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论。即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5）公平与效率统一论。在分配

制度中公平与效率并重，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再分配更加重视公平；（6）社会主义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论。实现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实现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7）判断改革开放与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条标准论。即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统一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自我发展与完善；发展是改革的目的；稳定是改革与发展的保证；（9）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统一论；（10）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统一论。既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搞“凡是”，搞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又不能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割裂和对立起来，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

编委会：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需要不断探索和深化研究，要重视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作者：这就需要看实践的发展和经济学界的研究状况了。当然，我更寄希望于年轻的经济学者们能在这方面作出贡献。

卫兴华“始终坚持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肃性，即使在‘左’的理论和政策盛行的情况下，也不随‘风’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风”。“从不人云亦云，而是执著地追求真理。”

——《卫兴华经济思想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卫兴华教授是以马克思主义态度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典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楷模，是当代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大师。他的科学观点令马克思主义者推崇、非马克思主义者认知、反马克思主义者敬畏，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贵财富。”

——《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简介》，《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8期

“他的真知灼见，有理有据、论证严密，得到经济学界的首肯，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中共资本论研究权威卫兴华》，香港《前哨》杂志1999年11月号
“中国稳健的改革派经济学家。”

——日本《中国研究月刊》，1989年

“立学贵在勤，立言贵在诚，立论贵在真，立策贵在实，这就是卫兴华。”

——《求真学人卫兴华》，《中华儿女》2005年2月第213期

“卫兴华的人生、为人、学问，不饰浮华，只重求真务实。”

——《卫兴华：求知路考》，《中华英才》2002年11期

“不跟风、不盲从，以事实为依据，以真理为目标，树起了一面讲真话的旗帜。”

——《理论界讲真话的一名学者》，《福建论坛》（社会科学版）2002年11期

“卫兴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不仅是指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同时也是指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研究经济学所树立的典范”。

“认为自己认识是对的而不管任何风云变幻敢于坚持，发现自己认识有误而又勇于修正自己的观点。”

——《用马克思方法创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月刊》2002年第11期

“构建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让理论成为真理的喉舌，这是卫兴华教授终生追求的理想目标。”

——《让理论成为真理的喉舌》，《高校理论战线》2006年第7期

论文选集

LUNWEN XUANJI